

温州經濟格局

报刊資料選輯

溫州鄉僑報社編印

温州經濟格局

报刊資料选辑

温州侨乡报社编印

一九八六年七月

前　　言

以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小商品生产、小城镇建设为特点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各方面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早在一九八三年，温州农村商品生产还刚刚起步，“小荷才露尖尖角”，万里副总理就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并高度评价它“展现出农村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此后，党中央、国务院及中央有关部门，本省和外省的许多领导同志及著名的专家学者，又亲临温州调查、指导，省内外的新闻、科研单位的同志来温州采访和调查研究的也络绎不绝。他们来温以后所写的调查报告和各类文章，对温州农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温州农民在我国举世震惊的大变革中所显示出来的开拓创新精神和经营才干，作了生动的描绘和充分的肯定，并且在理论上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对群众的实践经验及其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和理论的概括，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这些文章见诸报刊以后，温州的干部、群众往往以先读为快，竞相传阅，并且从中吸取继续前进的力量，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温州农村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形成今天这样生机蓬勃、波澜壮阔的局面，除了应归功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外，也是同各级党政领导和新闻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在舆论上的支持和思想、

理论上的引导分不开的。而人民群众在这场变革中表现出来的对理论学习的浓厚兴趣和满腔热情，也是前所未见的。改革的实践的确在呼唤着理论的繁荣。感到不足的是，许多很有新意和深度的重要文章，还没有送到广大关心温州农村建设的读者手里。有感于此，我们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把一九八三年以来省、市以上报刊发表的报导和论述温州商品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文章，汇集编印成册，以供学习参考。对于资料缺乏的农村工作同志，可以省却许多搜集翻检之劳。

当然，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处在早期阶段，需要不断的“总结、完善、发展”，对这方面的理论探索也还刚刚开始，随着农村改革第二战略部署的展开，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种与自己的亲身实践紧密结合的理论学习和理论探索的热情，将会与日俱增。我们相信，这本选辑里的许多文章将会使读者受到深刻的启发，并将在阅读以后享受到一种理论领悟的欢愉。

对于本书的命名，编者曾颇费斟酌。选辑中大部分文章都有“温州模式”的提法，但对此尚有争论，我们还是选用了大家都能接受的“格局”说。同时，限于篇幅，许多本地作者写的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只好割爱了，请予鉴谅。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前 言

万里、郝建秀温州考察纪实 (1)

温州行 费孝通 (2)

温州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 王 芳 (27)

试论国营、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必然性

和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 董朝才 (36)

对温州经济发展的探索 卢声亮 (53)

温州农村商品经济新发展 何荣飞 (60)

乐清县万元户情况的调查 马 洪 (67)

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温州农村调查组 (75)

唯实的思路 创造性的实践

——温州发展家庭工商业的调查

..... 刘振贵 陈坚发 (108)

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动向 王小强 白南生 (116)

小钮扣振兴了桥头镇 丁雪萍 (128)

乡镇工业看苏南 家庭工业看浙南 桑晋泉 (133)

农村金融体制面临新的问题 柯柏杰 (139)

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基本特点

..... 《世界经济导报》 (143)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

——“温州模式”考察报告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查组 (145)

温州掠影	陶友之 严亚熊	(161)
论温州农村经济模式的意义	张仁寿	(165)
温州农村产业结构的系统分析	李 红 张而立	(177)
“温州模式”与市场体系	李 红 张仁寿	(184)
“温州模式”与小城镇发展	涂晓弦	(192)
论“温州模式”的特点和成因	张仁寿	(198)
温州农村的资金市场及其管理问题	李 红	(209)
“温州模式”与中国农村经济的腾飞		
	杨建文 周一烽 真理	(218)
金乡归来论短长	王 青 黄金斌	(233)
以商促工 拾遗补缺 富国利民		
——温州市家庭工商业迅猛发展的特点		
	刘振贵 陈坚发	(253)
附 录：东海之滨的明珠——温州		(261)

万里、郝建秀温州考察纪实

今年春天浙南雨水似乎特别多，还没到梅雨季节，霏霏春雨就下个不停。柳芽儿笑了，麦苗儿乐了，可就是给飞机驾驶员添了难。然而，四月四日，一架三叉戟座机还是穿透一百来米高的低悬云层，降落在浙江台州湾的机场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从这里登上汽车，直奔温州，开始了为期五天的温州农村考察。

在短短的五天里，万里、郝建秀考察了一个个小商品专业市场，走访了一户又一户农民家庭工厂。他们仔细地听取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汇报，多次和基层干部、农民专业户、工商户促膝座谈。“中央领导同志真关心温州呐！”许多干部、群众高兴地这样说。

当前温州农村也是“最好时期之一”

万里、郝建秀刚到达温州市，就听取了当地党政领导干部关于温州情况的介绍。温州市农村是个田少人多、交通闭塞、经济基础薄弱的地方。近几年，这里由于贯彻了党中央关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路子，因而使全区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经济一活，全市经济也活了。一九八五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五十七点七亿元，比一九七

八年增长了四倍，市财政收入八年中翻了两番多。据抽样调查，农民年平均纯收入由八年前的一百多元增加到四百四十七元。绝大部分农户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满怀信心地向“小康”迈进。

汇报结束后，大家都想听听万里、郝建秀的意见。但是，万里笑着摆摆手说：温州的情况我们耳闻很多，还没目睹，看一看再说。

他们开始了紧张的考察活动。几天内，他们行程近千里，到过五个县。温州农村的十大小商品专业市场中的乐清县柳市镇低压电器市场、永嘉县桥头镇纽扣市场、苍南县农民集资兴建起的龙港镇以及乐清、永嘉、苍南、平阳、瑞安等县的许多农民家庭工厂，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柳市镇，他们沿着热闹的街市边走边看，街道两旁摆满着放有低压仪表电器的摊子。他们不时停下脚步，向农工商户询问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情况。在瑞安县塘下区，他们与家庭工业户、专业户代表促膝交谈，原定开一个小时的座谈会，开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天色擦黑时他们才起身赶路。他们每到一处都十分留心人们的衣着水平、精神状态和当地的市场供应情况。

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直到离开温州前一天，万里、郝建秀才向当地干部谈了他们对温州的观感。万里同志说，我们这几天很高兴，因为看到温州确实变了，和过去比大不一样了。政治上安定团结，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快，经济效益比较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精神状态很好。他说，我的总的观感是当前温州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历史最好的时期之一。党风也是好的，各级党政机关能实事

求是，反映人民意愿，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使人民富裕起来，安居乐业，这不正是我们要提倡的好党风吗？当然，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主流，而且也是能够解决的。

万里同志分析了温州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他说：温州市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这是有历史原因的。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进入中国时，沿海得风气之先。由于穷，过去许多人被迫到海外谋生当苦工，民间素有经商传统，信息比较灵通，农民有股子开拓精神、勤奋精神。这几年对新产品的开发、专业市场的形成，都起了积极作用。有这些优势，加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了开放、搞活的政策，鼓励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勤劳致富，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他充分肯定了温州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做法和取得的成就后，又引伸开去，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搞改革，正是因为旧的体制管得太死，束缚太多，把人搞懒了。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要增强经济的活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把人的勤奋精神、创造精神调动起来。这是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要政策对头，人们就会勤奋工作，勤奋学习，勤奋搞四化。这样，经济效益就一定好，发展速度就一定快。温州就是一个证明。

万里、郝建秀认为，要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繁荣农村经济，就应当各地发挥各地的优势，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只要符合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符合群众的利益和意愿，顺应改革潮流，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就大胆去干。对前进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解决。

两个文明的建设要结合起来

怎样把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和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这是万里、郝建秀考察中关心的一个问题。

四月六日，万里、郝建秀来到苍南县的龙港镇。两年前在地图上还找不到的这个有三万多人的镇子，是附近依靠商品生产先富起来的一批农民集资一亿二千万元兴建成的。他们看到农民们用自己的钱在镇上盖起那么一大片住房以及影剧院、学校和娱乐场所，又听镇领导人介绍这里过去很穷，外出讨饭的人不少，现在完全变了。他们高兴地说：这里这么快就由穷变富，真令人鼓舞啊！

万里同志问：“镇上社会秩序怎么样？还有打架偷盗的吗？”

“老百姓都忙着搞生产，没工夫去打架了。偷盗的也很少很少了。”镇领导同志回答。

“这就好。”万里同志接着说：“我们不是要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吗？我看要抓这两个文明建设，首先要让农民勤劳致富，让更多的农民早点富起来。两个文明中，物质文明是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郝建秀说：“富起来才能真正做到安定团结。群众有办法赚钱了，打架偷窃的事就少了，社会秩序就好了。”

“是啊！”万里又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是管子的两句话。现在社会上是还有一些消极面，随着物质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这些消极现象就会逐步减少。”

万里对陪同考察的同志说，农村越是富起来，越是要两个文明一起抓。地方财政有了钱，应当多用在城镇建设、环境卫生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上，还要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让他们不要忘记过去，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

万里同志沿途一再告诫当地的干部群众：大家要理直气壮地抓商品生产，但一定要把握住社会主义方向，要讲究正当致富、守法致富，要有职业道德，要使自己的商品生产真正于国家、于社会、于人民都有利，千万不可搞歪门邪道，坑人骗人。他仔细了解了柳市镇等地家庭工厂的产品质量后指出，这些小商品国营企业不愿意干，农民生产了，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应当提倡。但不少产品质量并没过关，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万里强调说，象柳市家庭工厂生产低压仪表电器，就要很好地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产品质量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否则搞不好要出事故，给使用者以至社会造成损失；要有测试手段，测试一定要严格无情，不能袒护生产者，不顾消费者利益，要树立一个观念，即生产时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要对社会、对他人负责。

在同瑞安县塘下区的十几位家庭工业户、专业户座谈时，万里表扬了鲍田乡鲍墙村党支部书记施正木。施正木和党支部一班人带领全村九十户人家发展织带生产，使全村农民跳出了穷窝，全村年产值达四百五十多万元。在这之后，他们踊跃纳税，并积极发展公共福利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设立了养老金、奖学金和奖教(教师)金制度。万里同志亲切地对施正木说：“你这个支部书记当得不错。你们带领群众勤劳致富，又体贴老人，关心教育，关心群众的文化生活和集体福利，功劳不小！”他指出，农村中的精神文明建设不

是空的。每个在党的政策鼓励下富起来的农民，都应当想到国家、想到他人，要尽力帮助更多的人也富裕起来，要按章纳税，对国家和社会尽应尽的义务。

各级领导要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搞好服务

万里、郝建秀在考察中不断和当地干部亲切交谈，互换意见。他们勉励温州各级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为发展商品生产、繁荣农村经济搞好服务。他们的这些话，使许多干部深受教益。

万里多次指出，一切上层建筑都是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各级党委、各级政府都应当成为发展商品经济的“服务员”。要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例如产销服务、信息服务、信贷服务、科技服务等等。农村中专业化商品生产如果没有各种服务，是难以发展起来的。现在有些乡镇企业原材料得不到保证，普遍缺乏先进设备，缺乏人才，技术水平也不高。各级政府有责任想法帮他们解决，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他要求温州市各级领导干部好好学习和贯彻赵总理在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报告和其它文件精神，围绕这些文件的精神，认真总结本地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经验和教训，既看过去，又看现在，也看未来。注意“总结、完善、发展”这六个字，分析一下本地哪些做法是好的，哪些问题值得重视。着眼于“发展”，做好今年、明年和整个“七五”期间的计划工作。还要多看书、多看报，广泛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学会宏观控制。这样，才有指导生产、搞好服务的主动权。

万里说，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对农村商品生产加以指导，也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指导商品经济，一是要有经济头脑，不能大而化之、马马虎虎。时间要分秒必争，经济要仔细核算。如增加一元产值能增加多少利润，节省一度电能减少多少支出，都要放在心上。二是要有两个手段，即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领导商品经济一定要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可以有一点，但不能多用。要利用信贷、利率、税收等杠杆对商品生产进行调节，支持一些项目，保护一些项目，限制一些项目。所谓法律手段，就是依法办事。对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要分清是主流还是支流，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是改革中的失误还是歪风邪气。谁搞歪门邪道，就批评教育谁，谁犯罪就依法惩办谁。切不可搞什么运动，搞“人人过关”，否则，会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妨碍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瞭望》记者 黄国文

(原载《瞭望》1986年5月12日第19期)

温州行

费孝通

近几年来，我主要是在江苏农村作调查，同时还到内蒙古、甘肃、北京郊区等地区进行比较性的观察。我看到了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普遍活跃了起来，而且发展速度出于一般人的预料，但也注意到各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农民的致富门道各具特色。去年听说有人提出农村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模式，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抓住今年政协召开全国会议前的一段时间，来到浙南看看颇为闻名的温州模式。

二月二十七日从杭州出发，途经东阳、丽水、青田来到温州。三月七日取道台州、绍兴回到杭州，历时九天，行程一千五百一十八公里。限于时间仓促，我在温州只走访了四县、五镇和参观了市区的两个街道厂，算不得是深入的调查，只能说是一次初探。

以商带工

比较是科学认识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行前，我脑子里带着的是一套苏南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到了温州，就试图去寻求两地的异同，从而在具体的比较中去认识这一地区的发展特色。

从相同方面而言，首先是江、浙两省具有人多地少的特点。浙江全省面积十万余平方公里，与江苏大致相仿，人口是四千万，比江苏少了二千多万。可是两省的地形特点差别很大，浙江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也就是说耕田面积远少于江苏，因此，浙江的人均耕田比江苏更少，只有六分八厘。就温州来说还要少，人均不到半亩田。其次，在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的三、四年间，温州地区的农村经济如同苏南一样，也有令人惊异的高速发展。一九七八年温州市农村的人均收入仅五十五元，一九八〇年为一百六十五元，一九八五年达四百一十七元。农村的经济结构也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翻转，一九七八年温州总产值中，种植业占百分之六十四，工业与其他各业加在一起占百分之三十六，而一九八五年的二十五点三亿元总产值中，种植业占百分之二十五，工业产值猛增到十六点五亿元，占了百分之六十五，其他各业占百分之十。

同是人多地少，也同样是由贫变富，为什么人们对苏南肯定的较多，而对温州的看法却有较大的分歧呢？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探求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汽车刚驶进金华以南地区，只见公路两旁不时出现一块块木牌，上书“货运温州”、“货运山东”等字样，这是我在江苏未曾见过的新鲜事。运出运进的货物都是什么呢？来往运输的数量怎么会那么多？货又到底怎么运的？哪些人在运？我的这些疑虑直到走访了温州的桥头镇才得以释然。

桥头镇坐落在瓯江北侧的山峦之中，偏离杭温公路三十五公里，属永嘉县桥头区管辖。该区共有五千多户人家，近二万五千人，人均耕田零点二八亩，如果只从事农业，全区

八千名劳力就会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剩余。据介绍，历史上桥头人解决人多地少的办法是外出经商，靠农商结合维持人们的生计。用当地流传的话说：“桥头生意郎，挑担奔四方”。七十年代中期，桥头镇开始出现了一些经营表带、手套、发夹、塑料花等小商品的市场。一九七九年据是一位姓王的弹棉郎从江西买回一批处理纽扣，在镇上摆起了纽扣摊。谁知这一摆竟成了气候，一年之后，镇上卖纽扣的摊子发展到一百多家。一九八三年初，县政府批准桥头镇为纽扣专业市场，至今全镇有七百多个纽扣店、摊，全国三百多家纽扣厂生产的一千三百个品种的纽扣在这里都有销售。一九八四年桥头镇销售的纽扣共计五十多亿粒，相当于全国每人五粒，日成交额高达十六万元。去年的年成交额为八千万元。一九八一年，桥头人不再满足于单纯做买卖，他们开始用经商积累的资金办厂，生产纽扣，现在全区有四百三十家纽扣厂，其中三百家是家庭工厂。桥头市场销售的纽扣有百分之四十是这些工厂自己生产的，年产值近二千万元。这是温州模式以商带工的一个典型。

桥头纽扣市场的繁荣不仅消化了本地的剩余劳力，还吸收了大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现在市面上做纽扣生意的就有五千多人，全区工业从业人员也接近此数。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还有九千人在全国各地搞采购和销售，他们人虽不在桥头，但牵动着纽扣市场的生命线。据说这批人大都是昔日的“卖货郎”，现在的新名称叫“购销员”。这批购销员组成了遍布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流通网络，将各色纽扣和其他生产资料采购进来，“货运温州”，同时把桥头的纽扣推销出去，“货运山东”等地，将商品直接送到各地的售货

店、成衣铺和用户手上。正是有了这支队伍，桥头的市场才充满生机，越搞越大，被人誉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

小纽扣、大市场——桥头群众闯出了一条富裕之路。据估算，一九八四年全镇工商两业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六，全镇六百余户人家中万元户达百分之八十，人均收入六百元，纽扣市场上交国家的税利也逐年向上“翻”，一九八三年是九十五万元，一九八四年是一百八十二万元，一九八五是三百一十一万元。三年来，全镇建房八百四十五间。有趣的是在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三层或四层的新楼内，底层设铺面，一般由女主人经管，二楼是生产车间，大多由儿女当家，三、四层是居室，男主人则外出担任供销员的角色。设摊经商、办厂生产和外出供销等商品经济的环节，就这样有机地结合于一个个家庭之中。

听完介绍，我想去市场转一转，不料刚参观了一家店铺，就被凑热闹的人群团团围住了，反倒成了“参观对象”。当地干部解释说，由于桥头纽扣品种齐全，在上海等大城市转悠一星期不能完成的采购任务，在桥头只需个把小时就可如愿以偿，所以现在每天来桥头镇的外地客商总有二三千人。这下可好，本来就很窄小的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保卫人员怕出意外，就将我塞进车里一溜了事。

八仙过海

桥头的生意郎勾起了我对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的回忆。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我从伦敦到柏林去和我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我们的房门，打开一看是一位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乡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可我们彼此